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美国大学治理： 结构、过程与人际关系

Meiguo Daxue Zhili:
Jiegou Guocheng Yu Renji Guanxi

刘爱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美国大学治理： 结构、过程与人际关系

Meiguo Daxue Zhili:
Jiegou Guocheng Yu Renji Guanxi

刘爱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大学治理：结构、过程与人际关系 / 刘爱生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0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ISBN 978-7-5203-1387-2

I . ①美… II . ①刘… III . ①高等学校—学校管理—研究—美国 IV . ①G64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341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责任校对 秦 婵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303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本书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
课题编号(15HQZZ022)项目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1)
一 美国大学的成功	(1)
二 中国大学的借鉴	(3)
三 研究的意义	(4)
第二节 文献综述	(6)
一 国外相关研究	(6)
二 国内研究现状	(17)
三 简要述评	(22)
第三节 概念界定	(24)
一 美国大学	(24)
二 大学治理	(24)
三 文化	(27)
四 价值观	(30)
第四节 研究的思路、内容与方法	(32)
一 研究思路与内容	(32)
二 研究方法	(33)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36)
第一节 组织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	(36)
第二节 跨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维度理论	(40)
一 何为跨文化心理学	(40)
二 国家层面的文化价值观	(40)
三 不同国家文化中的组织行为	(43)
四 不同国家文化中的大学治理	(46)
五 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	(49)

第三节 分析框架：文化（价值观）—人—治理	(56)
第三章 美国大学治理的结构	(58)
第一节 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的演变	(59)
一 “学术法人—董事会”治理结构的形成	(59)
二 共同治理模式的形成	(65)
第二节 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的共享性	(69)
一 外部治理结构的共享	(71)
二 内部治理结构的共享	(82)
第三节 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的制衡性	(87)
一 外部治理结构的制衡	(89)
二 内部治理结构的制衡	(92)
三 内部治理结构制衡的制度设计：以“不信任投票”为例	(95)
第四节 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的松散性	(97)
一 外部治理结构的松散	(98)
二 内部治理结构的松散	(103)
第五节 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的法治性	(107)
一 形式意义的法治	(109)
二 实质意义的法治	(114)
第六节 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的文化分析	(119)
一 低权力距离与美国大学治理结构	(120)
二 短期导向与美国大学治理结构	(126)
第七节 小结	(131)
一 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的优点	(132)
二 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的缺陷	(133)
第四章 美国大学治理的过程	(135)
第一节 美国大学治理过程总览	(136)
一 美国大学治理过程：一个整体框架	(136)
二 美国大学治理过程：一个时间坐标	(138)
第二节 美国大学治理过程的模糊性	(139)
一 何为模糊	(139)
二 美国大学治理过程的模糊性基础	(142)

三 美国大学治理过程的模糊性：基于组织选择的垃圾桶模型	(145)
四 个案研究：以弗莱西大学的教师招聘为例	(151)
第三节 美国大学治理过程的政治性	(155)
一 何为政治	(155)
二 美国大学治理过程的政治性：基于大学治理的政治模式	(157)
三 个案研究：以夏威夷大学的学费设定为例	(165)
第四节 美国大学治理过程的文化分析	(173)
一 美国大学治理过程的模糊性与弱不确定性规避	(173)
二 美国大学治理过程的政治性与个体主义	(180)
第五节 小结	(185)
一 美国大学治理过程的模糊性评价	(185)
二 美国大学治理过程的政治性评价	(186)
第五章 美国大学治理的人际关系	(188)
第一节 美国大学治理中的各种人际关系	(189)
第二节 美国大学教师与行政人员的关系	(192)
一 美国旧学院时期教师与行政人员的关系	(193)
二 美国大学转型时期教师与行政人员的关系	(198)
三 美国大学多元化时期教师与行政人员的关系	(211)
第三节 美国大学治理人际关系的文化分析	(231)
一 美国大学治理中的人际信任与低权力距离	(231)
二 美国大学治理中的人际冲突与个体主义	(237)
第四节 小结	(243)
第六章 结论与思考	(245)
第一节 结论	(246)
一 理性：大学有效治理的基础	(246)
二 自由：大学有效治理的关键	(248)
三 平等：大学有效治理的保障	(252)
第二节 对中国大学治理的若干思考	(255)
参考文献	(260)
后记	(288)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一 美国大学的成功

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曾说过：“任何对于人类未来发展感兴趣的人，应当特别对美国进行研究。”^① 罗素之所以这么断言，显然与20世纪初期美国经济、军事与文化的迅速崛起密切相关。时至今日，美国的霸主地位依然无人能撼动。就高等教育而言，美国的优势地位非常明显，而且十分稳固。在2011年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研究中心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美国有8所大学进入世界前10名，53所大学进入世界百强。^②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美国大学的成功？

斯坦福大学的戴维·拉伯雷（David Labaree）教授认为以下两大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美国大学根深蒂固的市场化取向，二是美国大学拥有广泛的政治支撑。在这两大因素的影响下，美国高等教育形成了独特、复杂的结构。而这种结构就包括治理机制的核心（独立董事会），以及相互支撑与相互制衡的三种权力体制（传统权威、理性化机制和领袖魅力）。^③ 换言之，美国大学独特的治理机制是其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① 滕大春：《杜威和他的〈民主主义与教育〉》，转引自〔美〕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38页。

^② 周凯：《上海交通大学发布2011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http://www.jyb.cn/world/gjsx/201108/t20110816_448426.html。

^③ [美]戴维·拉伯雷：《复杂结构造就的自主成长：美国高等教育崛起的原因》，《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年第3期。

无独有偶，加州大学前校长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也指出，美国大学上升到世界很高的地位，与分担的和授权的学术治理的兴起是连在一起的，而且大部分可归因于这种学术治理机制。这是一个建立在达成一致而不是命令的基础上的制度。^①

拉伯雷和克尔的分析可以在许多个案中得到反映。例如，哈佛大学在19世纪后期还是一所自负的、地方性的、宗教性的小型学院，但在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Eliot）的执掌下，迅速转变成一所大型的、在当时所有主要学科都处于领先地位、培养社会一流人才的大学，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学校治理结构的改革。第一，埃利奥特新设置了院长职位，并赋予它很大的权力；第二，规范教授会议的议程，形成一种由多数人意见达成决议的民主治理程序，并最终奠定了决策的分权机制。^②再如，加州伯克利大学在19世纪90年代也是一所薄弱的地方性院校，虽拥有大量土地，但建筑破旧，捐赠奇缺。在本杰明·韦勒（Benjamin Wheeler）掌校下，伯克利开始蒸蒸日上，并在不久之后发展成世界一流大学。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赋予了学术评议会大量权力，把大量的教师融入大学的管理事务中来，并最终形成共同治理的机制。^③加州大学的一位前任校长理查德·阿金森（Richard Atkinson）就指出：“加州大学迈向辉煌的第一步始于75年前引入共同治理制度。”^④

正是鉴于美国大学治理机制与美国大学崛起之间某种必然的联系，促使笔者把“美国大学治理”作为研究的选题。但不仅于此。作为一名“研究者”“文化局外人”（cultural outsider）兼“取经者”，研究美国大学治理就不能只停留于表面，仅关注它的“音容笑貌”，而应深入美国大学治理的内核，探讨它的“前世今生”。选择文化的视角，乃出于这方面的考虑。这不仅是因为“历史和文化分析是比较教育之根源”，更

^① [美] 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王承绪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

^② [美] 乔治·凯勒：《大学战略与规划：美国高等教育管理革命》，别敦荣主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

^③ John A. Douglas. Shared Governa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n Historical Review. March 1988. www.escholarship.org/uc/item/07q345d0.

^④ Richard C. Atkinson. Tradi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ttp://www.UCOP.EDU/pres/comments/tradition.htm>.

为重要的是，文化作为一个富于解释力的概念所具有的适切性，既可做表面分析又可做深入分析，既可分析教育组织的正式部分又可分析非正式部分。^①

二 中国大学的借鉴

在大众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大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长久以来的一些困惑挥之不去：“钱学森之间”“世界一流大学之梦”“诺贝尔奖之情结”；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对于大学治理结构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②但在现实中，高校依然作为政府部门的隶属单位而运作。政府通过掌控办学经费、批准学科设置、左右课题申报等手段，对高校办学实行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的全面渗透和控制。这种状况也直接转移到大学内部治理中：“官本位”“衙门化”趋势有增无减；高校内部行政权力泛化、学术组织行政化、学术权力弱化、学术道德腐化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张楚廷教授指出：“中国高等教育若要真正在学术的意义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不从体制上进行根本变革是不可能做到的。这种变革越是晚到，将越是积重难返，从而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造成更深重的伤害。”^③

在学者与媒体猛烈的抨击下，无论是政府还是高校自身都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从政府部门来讲，2010年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其中，第38条规定：“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第40条规定：“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结构……加强章程建设……探索建立高

^① [英]贝磊、[英]鲍勃、[南非]梅森：《比较教育研究：路径与方法》，李梅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页。

^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http://www.chinaacc.com/new/63/73/128/2006/7/zh853203901117600216170-0.htm>。

^③ 张楚廷：《从反对“产业化”到反对“去行政化”说明什么》，《大学教育科学》2010年第3期。

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① 从高校自身来讲，许多部属高校和地方高校，都先后成立了教授治学的组织机构，并制定了大学章程。不少大学还成立了类似董事会的治理结构。

无论是规划纲要的规定，还是高校自身的改革，都是回归学术本质、遵循学术规律的反映。它在意愿上是良好的。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份纲要就“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阐述，试图在体现中国特色的同时，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美国大学的治理机制。借鉴无可厚非，但最终效果令人怀疑，尤其在我国政府作为大学单一投资主体和行政高度集权的背景下。英国莱斯特大学教授克莱夫·迪莫克（Clive Dimmock）就指出：

全球化和国际化虽然促进了跨文化借鉴，促进了政策和实践的借鉴，但它们本身藏着危险因素。英美社会的理论、政策和实践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其他社会往往只是借鉴、移植在英美社会产生的政策和实践，这一事实往往会导致人们否定或低估文化（特别是社会文化）对成功地实施某项政策的影响。若对这一点认识不足，那么此种移植和借用将存在很大的风险。借用其他社会的政策和实践，只有当它们“在文化适切”时，它们才有可能得以成功推行。^②

迪莫克的忠告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它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一些外来的政策或制度看似合情合理，但往往难以落实的原因。因而，从文化的视野分析美国大学的治理，除了上文所提到的能够洞悉它的“前世今生”，还能为我们的借鉴提供一面镜子。

三 研究的意义

理论价值：目前，大学治理研究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研究中的一支“显学”，有关美国大学治理的研究也日趋增多。然而，正如张斌贤教授所

^①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全文），<http://news.qq.com/a/20100729/002511.htm>。

^② [英] 贝磊、[英] 鲍勃、[南非] 梅森：《比较教育研究：路径与方法》，李梅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页。

言：“诸多关于美国教育的研究，往往只涉及‘其然’而忽略了‘所以然’。”^①同样，陈洪捷教授也指出：“在目前的高等教育的研究中，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往往受到重视，而文化和价值这一层面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②基于这种情形，本研究力求在以上两方面有所突破。

首先，选取国家文化价值观作为研究的视角，分析美国大学治理的特征，挖掘治理背后的文化动力学，力求做到“知其所以然”。实际上，我国对美国大学治理的研究多半还停留在一知半解的状态，缺乏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更不用说深入美国社会文化来探讨美国大学治理的成因和特征。^③

其次，无论是进行比较教育研究还是国别研究，很大程度上或者说暗含的一个使命是为本国教育理论与实践提供借鉴，即所谓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然而，我们在借鉴中，在否定或低估他国社会文化的同时，也有可能不知道具体的文化差异，极易形成“盲人摸象”的情形，即各自都认为自己抓住了差异的核心，但实际上可能只是一个点或者一个面。本研究借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可以弥补这种状况，力求从一个全面的视角来探讨美国的大学治理（更详细的分析见下文）。在此意义上，本研究突破了以往的理论框架，应该会为今后的国别大学治理的理论研究添上一笔。

最后，本研究采用了“文化—人”的研究框架，其基本前提假设是：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人是为文化所塑造的，人是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按照我国学者的说法，这种“文化—人”的研究框架属于“文化学研究范式”，它不同于以往教育研究中的“政治教育范式”和“绩效教育范式”^④，或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中的“哲学思辨范式”和“科

^① 张斌贤：《总序》，转引自亚历山大·里帕，於荣译，《自由社会中的教育：美国历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②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③ 关于这一点，从目前有关美国大学治理研究的文献来看，就多有矛盾之处。例如，关于美国大学的共同治理，有些学者认为它是美国大学的核心文化，有些人认为它即将消亡。这种情形的出现，主要与研究者所掌握的材料有关，形成研究中的“盲人摸象”。

^④ 张应强：《中国教育研究的范式和范式转换——兼论教育研究的文化学范式》，《教育研究》2010年第10期。

学实证范式”^①。文化学范式超越了先前的范式，开辟了教育研究的新领域，赋予了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新的价值理念，促进了对有关教育学基本理论的新认识。^②总之，采用这一范式有助于开拓思维方法和学科视野，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大学治理理论。

实践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就一直在努力建设现代大学制度。2010年颁布的规划纲要更是明确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结构”。但由于我国大学是移植型产物，走的是后发外生型道路，这导致一些在西方发达国家合情合理的制度无法在中国生根发芽，各种违背大学常识的事情在中国大学屡见不鲜。香港地区学者杨锐就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与欧美大学模式无法轻而易举地相容共生……但出于强烈的追赶心态，中国往往不加批判地移植欧美大学模式。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如果缺乏传统文化价值的注入，中国大学将面临文化无根的危险。”^③因而，从文化的视角探求美国大学治理，不仅可以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而且还可以促进我们思考为什么一些美好的大学制度来到中国就“淮南为枳”。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 国外相关研究

美国学者约翰·科森（John J. Corson）1960年出版的《大学与学院的治理》（Governanc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可谓是关于大学治理研究方面的开山之作。这本书（包括1975年的修订版）也被选为20世纪以来有关美国大学与学院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100本经典著作之一。^④半个世纪过去了，伴随着全球化和市场化，世界高等教育的面目焕然一新，大学治理研究的专著与论文数以千计。一个详尽的综述如果说不是不可能的话，其难度也无异于登天。鉴于此，本书将综述国外（主要是美国）

^① 刘玉静：《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范式转换及价值重构》，《教育研究》2011年第10期。

^② 杨锐：《中国高等教育演化的若干启示——基于文化比较的视角》，《高等教育研究》2011年第7期。

^③ [美] C. 芬彻等：《美国高等教育经典著作百种（上）》，赵炬明译，《复旦教育论坛》2003年第3期。

有关大学治理研究的热点。根据其内容，基本上可划分为大学治理模式和大学治理结构。此外，共同治理作为一种具体的治理模式或者说治理结构，有关它的研究也很多，这里单独列出。

（一）大学治理模式研究

“模式”作为一种对复杂的现实过程的形式化、简约化的解释，尽管不可避免地会掩盖或埋没一些信息，但有助于认识（有时预测）它所代表的能动系统的某些方面，能够为我们考察组织运行的不同方面提供或多或少的便利，因而很容易受到研究者的青睐。就大学治理模式研究而言，因视角不同，大致可分为两块：一是从大学组织的治理结构和权力来源分析大学治理模式；二是从大学与政府、市场的关系来分析大学治理模式。

1. 决策权力的视角

克拉克·克尔和玛丽安·盖格（Marian Gade）根据校长在整个管理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权力和影响的不同，把大学治理分为四种模式：（1）行政权威与个人责任结合的科层模式，校长处于权力的中心地位；（2）同事协商模式，认为大学是一个共同治理的世界，校长和各种团队及委员会一起讨论、咨询，寻求一致。校长仍然处于这个过程的中心，主要起到沟通、协调、说服和仲裁的作用；（3）多中心模式，认为大学是被校内外各种权力瓜分的世界。权力彼此相互勾结、相互对立，没有一个能统领全局的权力和影响力。在这个系统中，校长需要新的技巧和性质：校长职务本身变成了一个权力集团，要小心翼翼地计算好每个行动；（4）无政府模式，认为大学是一个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在由周围社会所确定的各自领域里，自己行动的世界。个体决策是学术事业的核心特征。在此系统下，校长的权力与影响极其有限，更像宪政意义上的皇权。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不同类型的大学有不同的治理模式。^①

罗伯特·伯恩鲍姆（Robert Birnbaum）基于组织理论，把大学治理分为五种模式：（1）学会组织模式，大学被看作学者们的社团，大学在平等的社团中共同分享权力、拥有共同的价值观；（2）官僚控制模式，大学被看作一种官僚组织，治理的关键在于使结构和决策合理化；（3）政

^① Kerr, Clark; Gade, Marian L. *The many lives of academic presidents: Time, Place, and Character*. Washington, DC: Association of Governing Board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2003: 78-102.

党组织模式，大学被看成一种政党组织系统，拥有多种权力来源，不同利益团体在政策的制定和资源的分配问题上你争我斗；（4）无政府组织模式，大学是一个探寻自主的团体，校长的决策对学校组织的各子系统少有影响，但校长常常是学校最有影响力的人；（5）控制组织模式，这一治理模式能够依靠组织的负反馈进行自我调整和自我修正。这种模式尽管并不能取代其他大学组织模式，但可以通过综合其他组织模式，使人们对组织运行方式的复杂性和两难性有比较全面的理解。在对这些模式论述的过程中，伯恩鲍姆始终强调了大学文化的重要性。^①

威廉·蒂尔尼（William Tierney）在对科层（官僚）模式、同僚模式（collegial model）、政治模式和控制模式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大学治理的文化模式。他认为，官僚与同僚模式虽然是人们观察学术治理的常用视角，但它无法准确、全面地刻画目前学院和大学所处的环境。政治模式某些方面有助于分析治理过程，但问题在于它似乎把所有的组织行为和理论模式囊括其中。此外，学术生活大部分时候都是例行公事，政治模式不太适用。伯恩鲍姆的控制模式问题有二：其一，这一模式源于对学院校长和决策的研究，而不是学术治理，它对教师、董事会在决策中所扮角色几乎没有涉及；其二，控制模式运用在运行相对良好或基础稳固的组织上可能更有成效，然而在动态的环境下，平衡无法达成。他提出的文化模式，认为大学处于多种利益相关者和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下，一个人需要不断地对内外部公众解释环境和组织。因而，治理是一个符号化和解释的过程。^②

艾琳·霍根（Eileen Hogan）根据治理结构的不同，把大学治理归纳为四种模式：（1）一院制治理（Unicameral Governance）模式，由一个治理机构负责行政和学术事务；（2）两院制治理（Bicameral Governance）模式，由董事会和评议会或大学/教育委员会来治理，为大多数高校所采用；（3）三院制治理（Tri-cameral Governance）模式，由董事会、评议会和大学/教育委员会治理；（4）混合治理（Hybrid Governance）模式，校

^① Robert Birnbaum. How colleges work: The cybernetics of academic organization and leadership.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Inc., 1988: 83-84.

^② Tierney, W. G. A cultural analysis of shared governance: The challenges ahead. Higher Educatio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2004, (19): 85-132.

长和教师（同时包括一些学生代表）在大学治理扮演主导角色，这一结构包括董事会、学术委员会或教师委员会等。^①

2. 大学与政府、市场关系的视角

迪特玛·布劳恩（Dietmar Braun）根据信念系统、实质理性和程序理性三个要素不同的组合方式，把1980年代早期西方发达国家大学的治理模式归纳为三种：（1）共享模式，以当时的英国为典型。政府在大学治理中采用分权化手段，一般不直接卷入大学学术事务中；（2）寡头—科层模式，以西德、意大利、瑞士等为代表。大学的实质自治受到最大程度的限制；（3）市场模式，以美国为代表。在1980年代后期，受新管理主义影响，各国高等教育治理形态开始发生改变，一是转为效率导向模式，以法国、西德、意大利等为主；二是转为顾客/市场导向模式，以英国、新西兰等为主。其中，美国的治理模式受到的影响较小。^②

玛丽安娜·鲍尔（Marianne Bauer）和贝瑞特·阿斯克林（Berit Askling）从“权威—目的”分析框架出发，根据“权威”“目的”的不同组合，归纳出四种高等教育治理模式：（1）洪堡的政府模式（Humboldtian state model），崇尚学术自由和实质自治，政府的角色仅仅在于保护大学免受内外权力之争；（2）纽曼的自由模式（Newmanian liberal model），实质自治是大学自治的主要部分，政府一般不卷入大学学术事务中；（3）贝纳的社会主义模式（Bernal's socialist model），又称福利政府模式（welfare state model），大学是公共服务部门，其实质自治受很大限制，政府利用立法、预算等集权化手段控制大学；（4）市场模式，利益相关者都可以参与到大学事务中，政府扮演“掌舵者”角色。同时他们指出，任何国家不存在一种单一模式，而是会随着时间发生改变；受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不同国家的治理模式又呈现出一种趋同性。^③

^① Eileen Hogan. Background on governance models in higher education [EB/OL]. <http://lash3612094.blog.163.com/blog/static/51134539201183042642823/>.

^② Braun, D. New managerialism and the governance of universitie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raun, D. & Merrien, F., Towards to a new model of governance for university. London: Falmer Press, 2000: 253.

^③ Bauer, M. & Askling, B., Transfroming university: changing patterns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learning in Swedish higher education.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 1999: 74.

伊恩·麦克尼（Ian McNay）从“控制—文化”的视角出发，根据“政策控制”和“实践控制”的不同组合方式，归纳出四种高等教育治理模式：（1）共享模式，以英国大学的古典理念为特征，政府干预最少，大学在治理过程中注重谈判和非正式的沟通方式；（2）科层模式，政府干预较少，大学在治理过程中，决策实体具有等级性，注重规则和程序；（3）法人模式，政府对大学控制紧密，大学内部则通过协商谈判等手段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4）创业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与鲍尔和阿斯克林的市场模式相似。^①

（二）大学治理结构研究

治理结构涉及大学组织制度安排的核心问题。在治理中，结构是一个基础性条件，所有决策活动都是在一个基本的治理结构中展开的。正是因为结构的重要性，所以关于它的研究一直都是一个热点。从国外研究现状与趋势来看，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是大学治理结构的解读；二是大学治理结构的重构；三是大学治理结构的质疑，或者说是超越。

1. 大学治理结构的解读

作为研究大学治理的先驱，科森指出，大学内部存在两种权力结构，一种是传统的科层结构，另一种是学术权力范围内的决策结构。这两种决策系统不但在结构上分离，而且建立在不同的权力基础上，行政权力来自组织结构中的职位，专业权力来自专业知识和自主性。这两种权力之间存在着模糊和冲突，因而大学的治理并非易事。但是他没有尝试对学术治理提出改革方案和意见，因为他发现当时既有的知识非常有限，以至于不可能提出有任何针对性的意见。^②

迈克尔·科恩（Michael Cohen）和詹姆士·马奇（James March）把高等教育治理称为“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认为治理中的分权影响了校长对决策施加影响，并用垃圾桶来描述那些目标模糊、技术不定以及参与流动的组织的决策。其中，校长对学术政策的发言权不大，所扮演的

^① McNay, I., Channing cultures in UK higher education: The state as corporate market bureaucracy and the emergent academic enterprise. Braun, D. & Merrien, F., Towards a new model of governance for university. London: Falmer Press, 2000: 35–36.

^② John J. Corson. The governanc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w York: McGraw Hill Book Company, 1960.